

全部文章

现在时间

立即搜索

您的位置：首页 - 税收收入形势分析研讨会

“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2004/2005”全程（一）

作者： 发布时间： 2005-1-14 13:17:23

以税收收入形势分析为切入点透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专家学者彼此的思想碰撞中演绎中国税收的故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税务杂志社、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和广东省税务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2004/2005”于2005年1月9日在京召开。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界代表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对当前税收收入形势进行了分析与展望，并就税制改革、税收征管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会议由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主持：

× ? ? ? ? ? ? ? ? ? ?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新闻界的同仁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开一个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去年的税收形势非常好，税收增加了5200多亿，总体上说，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么一个会，想听听各种意见。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会的有很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也有我们税务系统的领导和老领导，有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同志、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司副司长舒启明、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丛明、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处长何成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的教授、也是我们税务协会副会长安体富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米建国、中国税务杂志社副总编辑尚力强、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总经济师饶立新、福建省地税局科研所副所长潘贤掌、湖南锦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胡茜平，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教授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财政与税收研究室的杨之刚主任、社科院财贸经济所的张德勇博士、马蔡琛博士后、张斌博士后，还有孔繁来、朱小慧副处长、副主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税务研究》编辑部的领导和编辑们，还有许多新闻界的，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中国税务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财经报、中新社、中国改革报、社科院的院报、中央电视台等等新闻单位的朋友。我们对大家在这么忙的时候，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来参加这个会议表示感谢！

我们下面请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教授高培勇同志致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 ?

各位领导、专家，媒体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2005年新年伊始，今天又是一个周末，知道大家非常繁忙，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参加我们的会，我和张处长一样，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和欢迎。

我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说明几点情况。我们这样一个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是在去年一月初由中国税务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两家联手发起举办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一个分析会，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几个事情，大家知道，从1994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一直是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税收可能是一个相对于其他若干因素来说最牵动人心的一个因素，因为税收收入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收入是多少，企业收入是多少，关系到国民收入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配的关系。由于税收问题的讨论已经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税务部门内部，也不可能把它控制在税收理论界内部，实际上它需要走出税收理论界的小圈子，走出税务部门这样一个系统，走到全社会去。所以我们想最好的一个选择，能够达到在全社会范围内讨论税收这个问题的目标选择就是由媒体和研究机构联手发起这样一个分析会，搭载媒体这一辆车，能够把我们的一些想法传递到全社会去。所以我们当时约定每年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税收收入的专家分析会，邀请各方面的著名专家来参加讨论，邀请在京的主要媒体来参与报道。我们的想法是以税收收入形式的分析为切入点，来分析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由此而发生的变化。当时我们规定了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刻画过去一年的税收运行轨迹，第二个任务就是描绘未来一年的税收运行格局。当时也作了一个设想，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会上让大家在彼此思想的碰撞中来演绎中国税收的故事。

去年是1月3号我们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杂志社的会议室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当时与会的专家有十几位，与会的媒体有七八家，而且实行了网上的直播和互动，影响是比较大的。今年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是照常举行，但是和去年有所不同的是，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和广东省税务学会会长加盟我们的主办单位，使得我们这次分析会的阵容更加强大了。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到会的有20多位专家，20多家媒体，中央电视台要录制专题节目，中国税务网等还要进程全程的报道。我们的两个杂志《税务研究》和《财贸经济》还要将专家的发言整理之后发表。所以看起来今天会议得到的重视程度和可能要产生的影响肯定是要超过去年。

另外一个需要说的就是今年的税收形势，现在看起来可能是更加牵动人心的话题，国家税务总局已经正式发布信息，就是去年税收收入总额达到25718亿元，增收率是25.7%，增收额是5256亿元，占GDP比重比去年提升了1.5个百分点，达到了19%。我们越来越感到1994年之后中国的税收收入有点像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魔方。我们回忆一下，从1994到1997年是年增1000亿元，199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费了很大的劲突破了1000亿元。1999

年就步入快车道了，1999年总额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1年突破1.5万亿元大关、2003年是两万亿，2004年达到了2.5万亿。

在这样的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态势之下，我们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它不得不迫使我们调高对税收收入的预期。有一次我问XX老局长说你们在设计1994年税制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中国税制是今天这个样子，他说没有想到。我记得金人庆2002年组织编写中国当代税收要论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预测，他说2004年中国税收收入将突破20000万亿，预测十一五结束的时候中国税收收入将高达三万亿到三万五千亿，现在看到这个预测都被打破了。两万亿是2003年打破了，三万亿原来预测是十一五才能实现，现在看来我是觉得可以做一个并非大胆的预测，2005年肯定会要突破三万亿元大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十一五结束的时候，如果是最保守的估计，一年就增加10%，而且在这期间中国的税制格局不出现大的变动，我觉得五万亿都有可能实现。所以，看起来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的确是值得我们十分关注的事情，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话题，不得不回答一些问题。当今中国税收以及税收运行情况已经搅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用搅动这个词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现在看起来我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就税收论税收，也很难关起门来在税收系统内部，在税收学界的象牙塔内来研究税收，惟一的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来讨论税收。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要归类的话可能归类为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就总量来讲，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直接带来的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税收水平的问题，一个是宏观的税收水平，一个是微观的税收水平。税收水平直接决定了GDP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分割问题。今年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9%，但是如果加上非税收收入，加上没有纳入预算的其他收入，那么可以说政府收入达到30%并非是大家需要分析的数字，写是一个实际的数字。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理想的中国税负水平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税负水平是不是在1993年设计税制的时候预期到的税负水平，现行的税负水平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适当的税负水平或者是最优的税负水平？第二个总量的问题，就是支撑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原来分析就是老三点：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征管力度加强。并且我记得金局长的书中做了一个分析，说经济增长占50%，后两个因素各占25%。今年的情况有点例外，政策性调整因素基本上没有出台，但是被物价上涨替代了，说起来就是经济增加、物价上涨、征管力度的加强。但是仅仅从这几个因素分析也难以圆我们的答案，比如说经济增长，现在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我们大胆的说是9.5%，加上物价是4%，加起来就是13%到14%的样子，但是税收收入的增幅已经超过了25%，剩下的将近一半的增幅是不是都来自于税收征管潜力的挖掘？我看到税务总局也有一个分析，就是关于中国税源分布的不均衡，也和税收收入的增长有关系。

就结构而言，中国税收收入两万多亿是一个大数，牵涉到怎么来的，通过什么地方来的，通过什么样的税制结构收上来的。所以就结构而言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现行税制和经济之间的匹配性问题，我们总说税收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趋势最为明显的一个要素，当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税制就要与时俱进。1994年设计税制的时候我们归纳起来有两个指导思想，一个是想方设法增加政府的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收入。另外一个设想就是抑制通货膨胀。因而现在看起来现行税制至少有两个明显的趋向，一个是税率明显比较高，比如说增值税，税基搞得比较宽等。那么，以现有税务系统的人力和技术水平，如果说全部调动起来，真是做到应收尽收我们的税负水平会达到怎么样的地步，现行的税制和经济之间是不是相匹配的，大家肯定要有思考。再比如第二点，税收收入和贫富差距之间的相关性。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逐步拉大了，甚至现在是急剧拉大。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曾经有过一套调节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有效制度。比如说在农村实现的农副产品统供统销制度，在城市实行的八级工资制度，可以非常有效地控制住货币流向农民家庭、城市居民家庭的闸门，非常有效地控制住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原有的制度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面对的格局就是，政府好像一下子失掉了能够对人与人贫富差距调节的非常有力的手段。非常令人欣喜的是，十六届三中全会调整财政分配写进了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它是这样写的，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分配都是财政政策的目标。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税收会担当起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主要角色。就是在销售环节、收入环节、财产的积累环节全方位地进行调节。我们目前两万多亿的税收规模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调节作用？它带来的效应究竟是对贫富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逆向的调节还是一种正向的调节？它对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究竟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大家肯定是要分析的。

第三个问题，税收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相容性。科学发展观提出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并且具体化为五个统筹，不管就总量而言还是就结构而言，五个统筹都和税收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城乡统筹，为了实现城乡统筹主要是着眼于支持三农，着眼于支持农村的发展，现在税制上拿出一个举动就是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当把来自于农村的税收全部取消之后，留下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农村地带是不是我们就要搞无税区，第二个是农村的基层政权，比如乡一级政府的运转就失掉了可以依赖的稳定的财源。财政部目前拿出乡财县管的模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由此带来一个事情，当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基本原则被打破之后，乡财县管之下的乡级政府实际上就成了县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那么它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再比如区域统筹，实际上是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差距历来是比较大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梯形经济发展政策，对于税收制度而言，我们实现的是区域性的税收优惠的政策格局。在统筹区域发展的条件下，区域性的税收优惠究竟还需要不需要保留？比如说涉及到企业所得税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改革话题，来自于东部地区的掣肘，来自于某些主管部门的疑虑，那么它将会对区域发展的格局，对统筹区域发展的格局条件下运行的税收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比如人与自然的发展，高速增长的税收是和我们目前的经济结果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目前的经济结构很多人归结为高成本、高消耗的环境，而且政府的高投入也促进的税收了高速增长。我们在今后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中能不能舍得税收减少的代价去调整经济结构？我们的税收制度能不能担负起治理污染、优化环境这样一种历史的重任？大家肯定也在思考。再比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大家已经看到目前最牵动人心的有关国内发展、对外开放的税收制度方面一个话题就是企业所得税改革问题，企业所得税的改革面临我们要不要取消一系列对于外商的超国民待遇。究竟外商投资到中国来图的是什么，我记得年前我们也在开这个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卢中原部长曾经讲，外商投资到中国来绝不是图税收优惠那点蝇头小利，人家的图是别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用外商投资税收优惠的蝇头小利去吸引住外商投资？是不是我们有必要舍弃内资企业这样一种不平等待遇和竞争力相对底下的代价去维持外商投资增长的政绩？我们也要思考。

第四个问题，税制改革的启动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依存性的问题。税制改革的必要已经不需要论证了，关键是税制改革的时机应该怎么选择，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税制改革时机被人为的一再推迟，原来主要是如何破解制约因素上，原来说财政减收是一个制约，这个可以破解。也说的在通货膨胀的条件，启动税制改革可能会产生逆向调节，但是这个逆向调查也可以破解。现在的制约因素、看来最大的因素我们觉得就是来自于政府部门自身，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来自于部门利益，来自于地方利益。而税制改革又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今年是改革年，能不能像温总理期望的那样在这个改革中把我们期望已久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尽可能多的提上议事日程，大家都比较关心。

我想到的今天在我们会上讨论的问题大概就这么几个，还有很多是我没有提及的，希望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请各位著名的专家来会诊，来提方案，使我们这样一个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能够更有成效，更有影响，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朋友们，新年好，我是福建地税的潘贤掌，受我们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局长的委托出席这个报告会，我们局长非常重视这个会议，本来要来参加的，但是刚好和我们工作会议碰到一块的，就叫我代他出席这个会议。

我们在基层工作过程当中发现税收收入这几年来连续高速增长，严重超出GDP的增长，也分析很多的原因，国税做一个分析，地税做一个分析，分析来分析去我们感到很困惑，除了征管的因素，税收为什么还会高速增长，感到很困惑。刚好中国税务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举办这个会，邀请我们参加，我们福建省地方税务局非常乐意参加这个分析会，希望在这个会议上得到一些答案。

2003年税收收入突破了万亿大关，增收3000亿；2004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税收收入又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增长了25%，增收了5256亿元，这还是一些税务机关采取了税收处理的手段对税收采取了压制增长。如果应收尽收那么增长幅度和超出的金额会更加惊人。因为我们知道厦门市的市政府一直再压，实际上很多发达的地方都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今年的GDP应该是在13—14%，那么税收收入增长是它的两倍。面对税收严重超出经济增长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第一个是税收严重超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国家是重复征税的税负过高。应该说税收收入的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匹配，应该是协调增长的态势。如果考虑所得税的累进作用，形势好的时候可能会略快于经济增长，形势不好的时候可能会略慢于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税收这样长期的、快速的、严重的超过经济增长肯定是有问题。我们原来那些所有没征的，也征了，加强管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征管水平的提高上，比如说信息化的水平上。税收收入增长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和使用情况上，但是不可能年年这样升上去，即使有其他的管征手段的增加。比如说我们福建省地方税务局提出要加强房地产的征管，征管的结果就是建筑安装，包括房地产是增长23.8%，但是收入增长28.2%，增收了一两亿已经是很不简单了，但是这个改变不了高速增长的态势。意思就是说除了征管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判断，如果不是税务机关长期的收过头税，我国税制长期高速增长就是税制水平的问题。这几年税收质量不断提高，收过头税情况很少了，更多的是在年底控制税收的增长，怕的是影响第二年的增长。所以我们税收长期超经济增长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是处在税制体系问题，存在严重重复课税的问题。这个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值税不是中性的，是生产型的，不允许固定资产抵扣所含的税。第二个是消费税已经成为一般生产资料和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进行重复课税。第三个是营业税，这个重复收费问题更严重。第四个是企业所得税当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税后扣除不足。个人所得税也是由于费用扣除项目和标准不合理。第六个是两税并征的地方小税种也存在。而且由于我们国家这两年来市场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比如说原来一双鞋可能一个工厂生产，现在我们到靖江调研不是这样的，一个鞋厂他的鞋底是一个厂生产的，鞋带又是一个厂生产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了，这样重复课税又更加严重了。

第二个观点是我们国家的财政税收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整个国家税收制度和理财思路将要按照财政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的条件进行调整，税制改革不能再拖了。根据统计，发达国家平均税负在35%左右，如果扣除社会保障税的因素，一般在13—15%，但是人家税负水平高了福利高了，我们税负水平这么高了福利很差。如果不计算高福利国家情况，发达国家平均税负就是3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在20%左右，我国的税收负担在1996年最低是10.18%，每年按照1.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2004年达到了19%，今年势必突破20%。1998年以来税收的弹性系数平均达到2.41，税收负担每年提高2.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在税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之前，我国税收增长将继续增长。如果扣除社会保障的因素，我们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考虑到我们国家大量的非税负担，我们国家宏观税负水平是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特别是和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相比，负担更加重了。就是说我们宏观税负太低，还需要大力提高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提高。这个理由如果进入十一五期间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已经很高了，再提高的理由已经失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再强调必须提高宏观税负水平，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严重超经济增长了。那么我们的税收制度必须大力调整，财政政策必须向公共财政过渡，所以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必须是向实现中性税收倾向，在十一五期间的税制改革必然是减税和向中性税收倾向的过程。

第三个观点，大家都在叫改革，而且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下来了，现在是谁在妨碍我国税制改革的进程，讲了半天雷声大雨点小，到底是什么因素在阻碍我们国家的税制改革？前面说了税制改革不能拖下去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明确的说法，说要改革，应该说广大纳税人是盼足了心，但是很快失望了，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一直是在研究研究当中，包括地方税制改革也是这样，真的很失望，包括我们领导说开了半天，最终文件报告还是研究当中，仍然遥遥无期。现在推迟税制改革的理由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担心减收会影响财政安排，以前动不动也是这个理由，从去年开始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认为减收会对宏观经济条件产生逆向调节的作用。我认为这两个理由都是不客观的，都是推迟税制改革的理由。减收只是静态的看，从动态的看不一定会是减收的。当然由于减税按照改革方案比较大的规模的减税可能会导致税收不再严重超经济增长，而是与经济协调发展，这样就会达到我们改革的目的。而且可以迫使财政改变安排不科学的做法。其次，当前的宏观调控是过热的行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过度投资一些形象工程、基础设施，比如说很多省铁路本来不要上现在上了，高速公路本来不要通，现在通了，都不是根据自己的财政实力，都是为了政绩赶快先做。所以这里面引起了一些钢材、水泥的过热。所以减税可以遏制这种情况，而且有利于宏观调控，而且减税有利于私人经济部门，私人经济部门的经济效益总比政府部门的经济效益有效，反而使得政府风险降低。所以这种宏观调控推迟税制改革是不可取的。税制改革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各方博弈的过程，关键是博弈各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且话语权掌控在税务部门 and 财政部门，广大纳税人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税务部门收入计划严重偏离事实，数据都是政府计划增长多少，财政略微高一点，税收略微高一点。比如说我们省经济增长目标是10%，财政收入就高一点了，税收再高一点。所以在开会的时候要要说高一点，但是又不能高太多了。所以这样的收入计划已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包括总局每年的下计划分给各个省，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本省下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的，下面也有自己的目标。所以政府和财政部门形成了一种借口财政困难推迟改革的惯性，在没有强大的外力压力下，这种惯性短期难以突破，需要强大的外力才能迫使它改革。在我国当前公共政策基本无效的情况下靠政府本身推进改革要有相当的过程，而且要有相当的压力，这个往往需要政治家执政为民的魄力才能打破这个僵局。比如说福建省，福建省的农业和农业特产很少，才四个亿，我和财政部门聊的时候他们说困难，没钱花，这样减税就减少了四个亿，他们是这样看的，说口袋里没有钱。后来刚好一个新的省长去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农业特产税去掉了，只留下了一个园林，农业税当时和财政部门聊的时候，我们说要去掉，因为只有一两亿。这个时候他又说还要保留农民的纳税意识，就讲这种话出来，这个简直不可思议。就是说一些理由根本不充分，就是说能不能改，什么时候改，话语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就需要政治家的魄力了，不然改革就被动了，我们地方就要跟在屁股后面了。根据200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对全球30个国家税收负担的比较分析，我们国家的税收负担系数已经达到了150%，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居世界第三位。如果按宏观GDP来算，我们的税收增量已经提高到了40%。这个就提醒我们现在总体纳税人总体负担已经加大了，现在需要我们采取措施降低我们纳税人的负担，加快税制改革，特别是加快地方税制改革，现在是中央财政喜气洋洋，地方财政哭爹喊娘。如果税制改革的话，中央收入会增加得慢一些，但是地方收入肯定会增加，这样有利于改变财政过分向中央集中的弊端。



(孔繁来整理 赵京桥上传)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您是第位访客